

【头条评论】

普华永道一再“失道”的警示

蔡恩泽

近日,财政部公布对普华永道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普华永道作为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此次因涉恒大财务造假被重罚。然而,普华永道的“失道”之举绝不仅在中国出现,在国际市场上,它也有不光彩的案底。

普华永道曾在东芝公司财务造假事件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东芝公司曾是日本的知名企业,但在2015年被曝出连续多年财务造假,夸大业绩,欺骗投资者。普华永道作为东芝公司的审计师,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未能充分履行审计职责,没有发现东芝公司虚报利润的行为,对东芝公司的财务报表存在的重大问题视而不见。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普华永道专业能力和独立性的质疑。

普华永道在国际市场出事,最近的一次是英国金融市场监管对英国普华永道处以1500万英镑的罚款,这是它与伦敦资本金融公司(LCF)参与了相关欺诈活动的最终结果。

普华永道在这些国际重大事件中的表现,充分说明它并非是在中国才“学坏”,而是多年来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违背职业道德和专业准则的行为。那

么,普华永道为何会屡屡出现“失道”之举呢?

一方面,利益驱动是重要因素。作为商业机构,普华永道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与大客户的合作中,为了维护业务关系和获取更多利益,普华永道可能会在审计过程中放松标准,甚至与被审计单位合谋造假。在面对一些强势客户的压力时,普华永道可能会为了保住业务而不敢过于严格地审计,或者在发现问题后选择隐瞒不报。这种利益驱动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审计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违背了其应有的职业道德。

另一方面,行业竞争压力也是原因之一。全球会计审计行业竞争激烈,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普华永道可能会采取一些激进策略,比如降低审计费用、缩短审计时间,这些做法可能会导致审计质量下降,增加审计风险。同时,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和期望,普华永道可能会在审计过程中做出妥协,失去应有的原则和底线。

此外,监管不力也为普华永道的“失道”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虽然各国都有监管机构对会计审计行业进行监管,但监管力度和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一些监管机构可能存在人手不足、

专业能力不够等问题,无法对普华永道等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有效监管。同时,监管法规的不完善也让普华永道等机构有可乘之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逃避监管,继续从事违规行为。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据不完全统计,普华永道去年在中国的107家A股客户中已有30家上市公司陆续取消了合作。今年原计划新增的7家“招商系”客户,截至7月24日也已全部解约。去年普华永道作为审计机构的港股上市公司中,也有近30家取消了与普华永道的合作。

普华永道的“失道”之举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教训。首先,此次事件引发了对审计行业的深刻反思。审计作为市场经济的“看门人”,其职责是对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为投资者提供可靠的信息。必须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审计师应该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在哪个市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客户,必须保持独立性和职业怀疑精神,严格遵守审计准则和法律法规,为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

其次,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完

善监管法规,提高监管效率。监管机构应该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日常监管,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对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提高违法成本。同时,应加强国际间的监管合作,共同打击跨国财务舞弊和审计造假行为。

最后,投资者也应该提高风险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不能仅仅依赖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还应该进行充分的调研和分析,了解被投资企业的真实情况,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遭受损失。

在中国,财政部对普华永道的行政处罚决定,过罚相当、责任清晰,充分体现了监管部门对财务舞弊和审计造假行为的零容忍态度。这一决定不仅是对普华永道的严厉惩罚,也是对整个会计审计行业的警示。

此次普华永道在中国被罚,不要怨天尤人,责怪中国市场,不要试图让中国背锅,要从自身找原因。

希望普华永道能够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吸取教训,重新树立起专业、公正、独立的形象。同时,也希望其他会计师事务所能够引以为戒,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审计质量,为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资本策论】

8月央行资产负债表里 国债比重提升

孙璐璐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更新的资产负债表显示,8月央行“对中央政府债权”环比增加近5071亿元,这是继2007年12月后,该科目时隔16年重新净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增加不同于央行近期公告的8月通过开展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净买入国债面值1000亿元,对比分析看,5071亿元的环比增量可能意味着当月央行不仅开启了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还落地了国债借入操作,为未来稳定国债收益率走势储备“真枪实弹”。

早在7月初,央行就预告将择机开展国债借入操作。彼时央行透露,已与几家主要金融机构签订了债券借入协议,将采用无固定期限、信用方式借入国债,且将视债券市场运行情况,持续借入并卖出国债。信用方式借入或意味着央行从金融机构手中借入国债的过程中无抵押物;而无固定期限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所借入的国债期限不固定,另一个或意味着央行持有借入国债的时间可视债券市场变动情况相机抉择,因此,从会计处理角度看,即便是借入的国债,将其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也是谨慎的做法。与“对中央政府债权”科目变动相对应的是,8月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端“其他负债”环比大幅增加了近4800亿元,二者规模大体相当,或为借入国债操作在负债端的记账处理。此

外,当月资产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减少近4000亿元或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到期等原因导致规模减少有关。

目前,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持有的国债超过2万亿元,占总资产的比重仅4.6%且多为特别国债,未来随着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步入常态化,国债在央行资产中的占比预计有提升空间,但这与量化宽松(QE)有本质不同,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是基础货币投放和流动性管理的工具之一,对流动性有投放和收回的双向影响。而央行的国债借入、卖出操作,虽然操作标的都是国债,但目的是为了维护债券市场稳健运行,防范国债(尤其是长期限国债)收益率持续快速单边下行,助长市场一致性预期,避免形成“羊群效应”和积聚利率风险。

受美联储降息幅度超预期等因素影响,昨日我国国债债市波动加大,10年期国债活跃券收益率一度明显下行逼近2%关口,下午则出现回调反转;当天国债期货由涨转跌。当前,国债收益率水平处于低位,1年期国债收益率与政策利率、同期限市场资金利率出现倒挂,反映出资金涌入债市的交易拥挤。从央行多次提示债市风险,到最新的资产负债表中“对中央政府债权”项下国债规模大幅增长,可以看出央行对债市拥挤交易的持续关注 and 有所应对,后续市场仍有必要重视单边持续行情的潜在风险。

【商道论衡】

找准正宗土特产“难买难卖”的症结

李宇嘉

近期,笔者在西部某省调研乡村旅游,当地文化旅游部门的负责人说,他们省各个县市都山清水秀,气候宜人,为各种土特产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辣椒、各色水果、富硒茶等,每年也都会接待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但令人困惑的是,很多到过此地的游客在网上抱怨说,买不到正宗的土特产;而当地的百姓也反映,这里物美价廉的特色农产品找不到买家。

土特产是一个很常见的概念,特指某地特有的或特别著名的产品,一般都是农副产品,或称作特色农产品。一般来说,土特产仅在当地的知名度较大。因为,其之所以有特色,主要依托当地特殊的气候、土壤、水质,一旦脱离了具体的地域,就不能称其为土特产了。比如,有“国民辣酱”之称、原产地为贵阳市南明区的老干妈,前段时间传言采购外地的辣椒食材,导致口味不正宗,被游客诟病,甚至被超市下架。

当然,特色农产品“难买难卖”,有信息闭塞、缺乏推广渠道等原因,但乡村旅游模式“非在地化”才是根源。近年来,乡村旅游投资和振兴项目很多,但各种规划和投资最大的问题,就是脱离农民、脱离乡村特色。往往是下乡资本或旅游公司决定规划、建设和运营,产品结构单一、同质,比如农家饭、田园观光、赏花采果、钓鱼和农事体验等“千村一面”的旅游项目。

笔者参观的一个文旅民宿项目,主题是避暑康养,资源优势就是适宜的气

候。前来此项目购买公寓或长短租的客人,主要是西南成渝地区的退休老人,以及暑期前来避暑度假的一家人。交谈中了解到,他们也想体验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甚至也想带小孩体验一下怎么育种、种植、施肥、除草、收获当地的特色水果——火龙果和猕猴桃,但当地并未设计对应的线路。

农村、村民以及农业生态,除了受用于文旅项目的建筑、物流、餐饮、环卫等,基本上被排斥在项目规划、设计、运营之外,甚至还因项目落地而被迫搬迁。不仅如此,许多乡村旅游项目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采取过于商业化的策略,缺乏对地域文化的挖掘和呈现,导致产品的文化内涵不足。前期大规模的基建投资、项目上马,导致后期运营被迫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

这就导致浓浓的商业味道下,文旅项目兜售的当地特色农产品,无法做到正宗。因此,破解特色农产品“难买难卖”的症结,关键是再造乡村旅游的逻辑,即“旅游大IP+小IP”的策略,打造“在地化”的旅游产业生态系统。上半场,在国家层面推进了脱贫攻坚、乡村全面振兴,民间层面推进了文旅投资、民宿发展等。这一轮大建设后,乡村基础设施硬件部分很完善了。

接下来,就是乡村运营的软件建设了,即强化既有乡村文旅项目大IP运营,吸引本地和外地、城市和农村的大量游客。然后,同步再打造多个小的IP,即特色农业和观光农业、农产品种植体验、美食打卡、研学游、亲子游等,并将当地的历史、文化、人文、风俗等元素嫁接在这些大小IP上。最后,将一个小小的IP串

珠成链,对接大IP创造的泼天流量。

目前来看,乡村文旅项目已出现了明显的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亏损的也很多。告别上半场的“大投入、大建设”,须转向下半场的“大运营”,即重视农民、农业、农村的全面参与,或者叫“从物到人”,打通乡村文旅项目这个大动脉与一个又一个特色农产品原产地的毛细血管,让广大农民分享城乡融合发展的红利,让城市来的游客体验到正宗的特色

农产品和乡土文化。

当然,这个过程需要基层乡村振兴局的统筹,将文旅、建设、农业、环保等部门协调起来,需要统筹制定全域旅游营销的整体策略,建立短视频+电商+基地体验+文旅项目的立体式营销渠道,需要对基层干部、乡村CEO、村民等进行“在地化”的培训,鼓励返乡创业。总之,游客体验特色农产品的过程,就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路径,也是乡村旅游走上正轨的关键。

四年来首次 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基点



诗曰:

悬空靴子终落地,美国降息合预期。
通胀压力虽纾缓,就业数据不给力。
道指跌宕选方向,资金进出下新棋。
全球市场酿变局,从容应对莫焦虑。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法治杂谈】

破解职场隐性就业歧视需要多策并举

唐伟

在“金九银十”招聘旺季,多位应聘者反映自己遇到了越来越多的“看不见的门”。据求职者透露,现在的就业歧视越来越奇特,有的公司在招聘时提出,此前有过劳动仲裁经历的应聘者不予录取;还有的公司在招聘时提出,应聘者名下不得有超过10万元以上的贷款。就业歧视让很多有能力的应聘者望而却步,他们在就业之路上遭遇了“隐形门”“玻璃门”和“旋转门”,这些门看似能过,而真的想过去却毫无例外地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障碍。

就业歧视是指没有法律上的合法目的和原因,采取区别对待、排斥或者给予优惠等任何违反平等权的措施侵害劳动者劳动权利的行为。当下,相对于性别、年龄、学历等直白的就业歧视,劳动仲裁经历、贷款记录和信用记录等新业态就业歧视正在不断扩展和蔓延,成为新的

阻碍就业公平的隐性就业歧视。由于隐性就业歧视隐蔽性更强,取证也更不容易,其危害性不容小觑。

我国《就业促进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均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歧视不仅损害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也损害职场生态和劳动者人格权,应从预防防和坚决治理。虽然对就业歧视的治理“一直在路上”,但效果并不明显,反倒出现各种隐性变异的新苗头,亟待采取更加精准有效的举措。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设置隐性歧视门槛,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律层面对禁止就业性别歧视作出原则性规定,并辅以具体的处罚措施,包括行政、民事甚至刑事的责任,不过现行法律针对就业性别

歧视行为的判定标准不明确,性别歧视行为认定难,给各类隐性歧视的滋生蔓延创造了条件。从既有的情况看,何为就业歧视,其表现的形式是什么,显性和隐性就业歧视的情形有哪些,就业歧视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就业歧视如何认定等,都需要更加详细而具体的操作指南或指引。否则,对就业歧视尤其是隐性歧视的认定将会受到技术性限制,从而让法律保护原则难以落到实处。

此基础性缺陷给司法机关、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等部门的有效监督带来了挑战,也让劳动者在维权时陷入了举证难的困境。因而当前亟待通过立法或法律解释的方式,明晰就业性别歧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设置就业性别歧视的判定标准,既能提供参照执行的标准,发挥外部监督和维权的效力,又能充分限制用人单位实施歧视的手段和方式,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除此,破除隐性就业歧视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改进就业性别歧视

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法律责任承担内容,尤其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由劳动者提供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改为由用人单位承担未实施性别歧视的举证责任,从根本上破除“举证难”的瓶颈制约。

其次,相关部门要采取常态化检查和专项督查等方式,加强对用人单位录用过程的监督检查,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惩治处罚,由此达到震慑教育、鼓舞人心的作用。此外,还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构建快查快处机制,充分激发劳动者自我维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真正把各类隐性歧视纳入管控,让用人单位不能“有恃无恐”。

最后,要强化宣传教育,引导用人单位在招聘人员时,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防范、抵制共识,给予劳动者最大的保护,构建全员参与、齐抓共管的外部环境。

【海外听涛】

新加坡立法善待平台工人

周凯利

刚到新加坡生活的时候,作为中产,我在购物消费的时候,会习惯性比较当地物价与北京、上海的区别。从我居住的新加坡“乡下”打车到市中心,行车距离10公里出头,使用当地最大的打车软件,高峰期的网约车计费一般在30元新币左右(将近160元人民币),在我的生活经验里,相当于早高峰从北京海淀打车到国贸20多公里的车费。

听起来,在新加坡开网约车,收入还不错呢。那么,谁都能在新加坡开网约车,并赚到“盆满钵满”吗?其实并非如此。只有至少年满30周岁的新加坡公民才能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且需要拥有相关职业驾照、英语能力证书、信用卡等,另外还须参加陆路交通管理局和平台的一系列课程及通过考试、定期身体检查。

有一次,我遇见一位40多岁的网约车司机,车里很干净,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道,还提供口罩和糖果。司机很爱笑,也喜欢聊天。他说他以前是在海运公司上班的,车子是从公司租赁的,除去租金、油费和其他消耗,大约一个月能净到手4000多元新币。我换算了一下,大概是一位新加坡普通司机中下层职员收入。司机笑着说,开网约车,时间会比较自由,比如工作半天觉得累了,我会找一家社区健身中心去撸铁、跑步。唯一的问题是,CPF(Central Provident Fund,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得自己往里面存钱。

这位司机遇到的困扰,很快便能解决了。9月10日,新加坡国会三读通过《平台工人法案》(the Platform Workers Bill),法案就为出租车司机、私家车司机以及外卖送货员等依赖在线平台谋生的工作者提供劳动保护。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平台工人法案》都被认为是新加坡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它试图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为新加坡约592万人口中的70500名平台工人提供保障。由此,新加坡成为全球最早立法保障平台工人退休、工伤和工会权益的国家之一。

平台企业的规范与发展,从来是关乎产业上下游的复杂问题,而与平台经济相关的“零工”从业者,例如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家政服务员的权益保护,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因为新加坡的“船小好掉头”,才得以在对平台工人的权益保护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至于正式实施后的效果,依然有待继续观察。

本版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